

孫中山解決國家整合困境之理念

彭堅汶*

在「政治發展」與「建國」理論之研究中，新興國家假如想要成功的建立民主政體，他們勢必要經歷許多「國家整合」的「困境」。尤其是在任何一個過渡及異質性的社會，許多明顯的「政治衝突」，通常都是導源於種族的歧異、語言的紛歧、地方及派系的鬥爭。換而言之，第三世界這些發展的現象，事實上即可能就是「國家整合」的主要障礙。因此，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不但須要給予嚴重的關切，同時也必須拿出強大的意志努力加以處理。不然，那些國家整合的困境，可能造成所謂的「毀國」而不是「建國」了。

至於中國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五「國家整合」的情形，孫中山先生雖然並未在其逝世前成功的完成「國家整合」的工作，但其所強調的一些重大的理念如民族同化、精英群衆之合作、意識型態之共識、平等導向之政策和國家認同感之建立等等，均是其國家整合的重要主張。因此，本論文的目的除在檢驗孫中山先生「國家整合」的理念外，亦在評估其對「第三世界」的「啓示」。

- 一、前言
- 二、國家整合的概念分析
- 三、國家整合與政治發展
- 四、國家整合的基本困境
- 五、國家整合問題的解決途徑
- 六、總結

一、前 言

對於任何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而言，「國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 的危機，基本上均是她們難以迴避的困境。尤其是在追求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與現代化 (modernization) 的競爭中，大多數國家普遍都具有「新國家舊社會」(new state and old society)的特質，因而不論新價值的建立或是新制度的運作，處處都

* 成功大學逸仙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因國家整合的缺乏而深受影響。再則由於國家整合的形成，往往受到「先天不足」與「後天失調」的困擾，又非一朝一夕所能畢其功，致使「國家整合」的問題，乃成爲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發展或進步中最重要的障礙之一。

現就以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建國而言，不但在理論上肯定國家整合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在現實的經驗上也提出許多頗具前瞻性的主張，以解決國家發展上的有關困難。不過，由於種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致使孫中山先生在逝世之前，並未親觀國家真正的整合，反而更爲感慨的指出：「中華民國自開創以至今日，已經有了十二年，這十二年內，無日不是在紛亂之中。從前有南北的分裂，現在又有各省和各部分的分裂，干戈相見，糜爛不堪。」（1973：V. 2, 583）又曰：「洪憲帝制一變而有宣統復辟，再變而有武人弄兵，解散國會，今則藩鎮割據之局成矣。國家法紀，蕩然無存，國烏乎立，此政治之劇變也。」（1973：補篇，11）。由此可見，國家整合的危機，不但是一般開發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時更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建國中感受最深的困擾之一。

二、國家整合的概念分析

依據「韋氏新世界字典」的解釋，「整合」（integration）乃是將「部分」結合成一個「整體」的意思（to make whole or to complete by bring together the parts）。而「國家整合」的概念，依據美國學者 Howard Wriggins 的界定，乃是將社會中分歧不相屬的部分（disparate parts）結合成一個具有相互關係的整體，或是將許多小社會（small societies）組合成一個國家（1966：181）。另外一位學者 Myron Weiner 則認爲「國家整合」乃是將文化及社會上分離的團體（discrete groups）結合在單一的領土內並建立共同國家認同的過程（1966：551）。至於孫中山先生的界定，由於「時代」的「差距」，當時並未使用「國家整合」的名詞，但其在建國理論及經驗之覺醒中卻一再強調所謂「國家統一」的問題，譬如孫先生嘗曰：「自民六護法以來，一般政界要人及主會群眾，皆知國家分裂若此，有統一之必要。」（1973：V. 2, 863）又曰：「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勵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保持國際平和。」（1973：V. 3, 249）。由此可見，孫先生所言「統一」的概念，雖不一定能說明國家整合全部的意念，但最起碼「國家整合」是包含有「統一」的意義在內。

再則，就「國家整合」或「統一」的概念來分析，本身仍然有其含糊曖昧的困擾存在，因為如同學者 P. E. Jacob 及 J. V. Toscano 在其研究中所指出，整合雖然是在某種程度上顯示社會內部強烈的凝聚力，但整合的標準是什麼？人民要有何種凝聚力才能使整合發生作用？卻是衆說紛歧，鮮有定論可言（詹文雄譯，1981：86）。不過，就一般學者的分析，國家整合的程度，乃是一種「相對」而非「絕對」的狀態，因為包括英美等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在內，經過嚴密的調查發現，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已經達到完全而又絕對的整合。由此可見，國家整合並非就是表示絕對相同或完全一致的意思，它只是說明國內的成員在某方面具有某種程度共同的「傾向」或意向而已。更具體而言「國家整合」乃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而達成「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minimum value consensus）（Huntington & Dominguez, 1975：66），或者說是國內各個團體間一種「異中求同」的過程。

三、國家整合與政治發展

美國學者 Lucian W. Pye 雖然曾指出沒有任何單一量表可以用來測定政治發展的程度（Packenham, 1966：204），但就發展的基礎而言，吾人仍然要肯定一項原則，即政治發展不僅要依賴國家整合的全面配合，而國家整合的成功與否，亦將影響政治系統的發展形態（Binder, 1964：623）。過去許多發展中的國家，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由於缺乏良好國家整合的條件，遂產生種種未蒙其利首遭其害的現象如暴力性的「顛覆」、騷亂、暴動及政權崩潰等，事實上這就是一项最好的教訓。因此，就政治發展的理論及經驗來分析，國家整合基本上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價值存在，現且從幾個變項逐一加以說明。

首先就「民族國家」的建立而言，依據名學者 Gabriel A. Almond 的研究，「民族國家」之形成，必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其一是內部有效的政治整合；其二是穩固的疆域；其三是與世界各國保持正常的往來（1970：167-168）。事實上這些直接間接都與國家整合有著密切的關係，否則政治派系的鬥爭，國土的分裂或主權缺乏獨立自主，民族國家也就難以形成了，再則依據學者 Myron Weiner 及 Karl W. Deutsch 的分析，國家整合的內容，通常包含（一）政治整合；（二）民族整合；（三）價值整合；（四）領土整合；（五）精英大眾整合；（六）語言整合；（七）文化整合；（八）整合之行為；（九）菁英整合；（十）行政區域之政治整合等十項（Weiner, 1966：555-561；Deutsch,

1968：67-70)。又依據學者Edward Shils的分析，一個現代化民族國家之成之，她必須保有下列幾項條件：(一)擁有溫和的民族主義；(二)具備現代化國家的制度；(三)國內的團結合作；(四)有能力提高國民之福利及生活水準；(五)有效控制國內的政治秩序；(六)存有相當程度之社會正義；(七)在國際間具有獨立自主的地位 (Shils, 19062)。由以上所列「國家整合」之內容及「民族國家」之條件來比較分析，吾人更不難發現，兩者乃是一體的兩面，不可完全區分。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建國中，除了強調民族國家之建立外，更堅決主張「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憲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1973：781)，事實上亦具體的表示，孫中山不僅肯定「民族國家」是其建國的目標，國家整合的問題更是其建立民族國家從未忽視的重要工作。

其次就民主政治與國家整合的關係而言，依據學者的研究顯示，民主政治如欲順利的運作，就非有國家整合的基礎不可，因為誠如學者Robert A. Dahl、Gabriel Almond、Harold D. Lasswell、Joseph Schumpeter 及 G. Sartori的說明，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產生領導者的程序，即精英團體只要藉著和平競爭的方式獲取人民選票並掌握決策的權力，就可稱之為民主政治。但假如人民和精英在意識型態上缺乏價值共識，甚者亦可以在理性的程序外進行惡性的鬥爭，則民主政治必然面臨到所謂「生存的危機」，更遑論要如何透過民主制度去解決種種政治的問題了。再則依據學者 J. Roland Pennock 的分析，民主制度之運作，假如欲充分發揮正常的功能，自然就必須有許多不可或缺的條件來支持，其中與國家整合有關的項目，就包含有(1)國家團結的意識；(2)社會的整合；(3)信任、容忍及妥協的意識；(4)尊嚴、自治及尊重他人；(5)公共的精神；(6)信守民主之程序及價值；(7)民族主義；(8)教育及識字 (1979：209-255)。由此可見，對於民主政治而言，國家整合的基礎，雖不能說是構成民主政治的充分且必要條件，但良好的國家整合有助於民主制度之運作，卻是無可置疑的通則。這就如美國學者Rupert Emerson 及Michael Brecher研究非西方國家民主腐蝕的現象所分析的，由於這些國家內部團結不足、大眾識字水準低落、社會異質性偏高及有暴力的習慣，遂使民主在國家整合無法形成中面臨崩潰的局面 (Emerson&Brecher, 1963：623-624, 637-638)。因此，無論如何，非西方國家如欲完成民主政治之建立，則首先就必須積極進行國家整合的基礎工程，否則民主的期望，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期待而已。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建國中，雖極

力鼓吹民權政治之建立，但當時由於國家整合的條件及結果並不顯著，遂使民主共和面臨嚴重的危機，故有言曰：「要中華民國成統一的國家，從此就要打破各省的界限……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採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便不能統一。」又曰：「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宗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後，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1973：V.1, 151）從以上孫先生親身的反省與說明，吾人更能肯定不論民主或民權政治之推動，假如缺乏良好的國家整合，則一切將只會是緣木求魚的奢望而已。

最後就政治安定、政治合法性與國家整合的關係而言，依據政治發展學者的研究顯示，國家整合乃是政治安定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因爲就理論上來分析，國家整合的程度愈高，體系成員對政治社會之結構認同自然愈高，相對的政治安定必定在政治合法性的升高中被肯定。因此吾人可以發現，國家整合與政治安定及政治合法性的關係，乃是成一正比結果，即國家整合愈高，愈有機會取得較高的政治安定及政治合法性。故美國學者James C. Scott在論及國家整合時，明白指出缺乏整合將導致暴力的產生，而「非正式的整合」或曰「形式的整合」也將導致腐化的侵蝕（1971：315），事實上亦有其相通的道理存在。因爲在缺乏國家整合的狀態下，團體或個人之間勢必難以相互的容忍，尤其是在講求理性競爭的民主社會，假如競爭者不能彼此信任，則惡性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非理性的鬥爭，所謂的合法性及政治安定，又焉有存在的可能？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建國的過程中，基本上就是處在一個缺乏國家整合的政治環境中，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國內始終充斥著地方割據或內戰的危機，而且到其逝世爲止，中國仍然處在分裂之中。故不論從理論或經驗上來檢驗，國家整合的確是政治安定及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任何發展中的地區除非使用極權的控制力，否則要在非整合的情況下和平的取得政治發展上的合法性及安定性，乃是相當困難的一項任務。

四、國家整合的基本困境

就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一般學者基本上均承認發展中的國家，乃是一深度分割的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勢必要持久的面臨分歧的挑戰（Young, 1976：3-22），因為畢竟它們或多或少都是國家整合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的障礙。至於那些因素才是構成國家整合的困擾呢，依據發展的經驗顯示，通常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歷史性的本土因素，如種族、語言、宗教等，其二則是後天失調的動態因素，如文盲、人口、派系及教育等。國父在三民主義建國的過程中，事實上也同時遭遇來自這兩方面的因素，因此雖極力推動國家整合的工作，效果仍然不是短時間所能充分顯露出來。現且就重要者一一加以比較分析：

（一）種族主義的困擾

依據人類學家 Roger M. Keesing 的研究指出，第三世界由於大都是屬於「多元種族」的地區，而各種族之間又存有相當排外的「種族主義」或「部落主義」，致使種族衝突的暴亂經常發生（1981：442-445）。同時，依據學者Doniel Lerner的剖析，「種族主義」通常存有一種「自我為中心」的意識，而其所形成的「封閉性人格」，自然就很容易產生以「反對」代替「自衛」的行為（1967：112）。因此當「種族效忠」極度擴張的結果，不但易於徒增國內發展上潛在的衝突意識，而且其在有形無形中所形成的「分離主義」，對國家整合而言，自然相當不利。因此，從種族主義經常所引發的「症候群」和種族歧視、種族暴亂來分析，由於種族之身分是與生俱來的，假如人為的因素不設法解決，則這種衝突必然有其相當的持久性，進而妨礙了國家整合的進行。尤其是許多掌握政權的種族主義者，往往會以「種族」為各種利益分配的依據，則其所形成的政治衝突，更是不利於政治安定的維持，而且亦與國家整合的目標背道而馳。國父 孫中山先生早期在從事革命建國的宣傳中，事實上也充分指出「滿人」種族中心主義的統治心態，他說：「滿政府立心之狠毒，無一不欲絕漢民之生計。但吾無怪其然！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說以滿洲少數之民族，不能不設種種之苛法，以斷絕吾人之生計。至糊口既無，又何暇思及其他，更何暇思及於國事？是滿洲政府愚民之政策也。所以吾人今日外出，受種種之困苦之苛辱，無非清政府為之！」（1973：補篇，122）由此可見，種族中心主義之於國家整合而

言，孫先生亦清楚發現其弊端，故極力加以批評。

(二)多元性語言的障礙

一般說來，「語言」乃是人類相互「溝通」與「了解」的主要工具之一，同時依據學者的研究顯示，語言的差異，往往會與種族的因素相接合，進而形成所謂「種族語言的紛歧」，對國定整合而言，自然有其不利的影響。美國學者David Sanders在分析「政治不安定」的因素中，事實上也同樣認為高度「種族語言派系化」的結果，即是形成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1981：62-96）。因此就國家整合的角度來分析，誠如學者Dankwart A. Rustow的說明，語言的統一既然是可以提供「國家認同」的基礎，而且也會直接影響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發展（1967：39），所謂「語言的統一」或是「語言的同質性」，便成為國家發展上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之一。可是就第三世界現實的發展經驗來分析，也許她們是了解語言統一的重要性，但受制於情況種族中心之義或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影響，許多國家雖然勉強選擇了國內某種語言為「國語」，但通常卻發生只有聲音而沒有文字的困擾，進而形成人民學習國語及普遍推廣的困難，有些國家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又採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的語言為國語，形成發展及整合上不甚協調的現象。現若以中國為例，事實上在國父建國的過程中，也遭遇這方面的困擾，因為中國幅員廣大，人口衆多，再加上悠久的歷史發展，各地的方言甚多，而且再加上各種不同種族的差異，自然很容易形成西方學者Eric A. Naordlinger所謂「地域－語言－種族的分裂」（1977：149-156）。因此對於「語言」與「國家整合」的關係，孫先生在三民主義建國的理中，相當強調「語言統一」的問題，故有言曰：「-----第三大的力量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1973：V.1, 4）又曰：中華共和國擬維持官話，為統一語言之基礎。」（1973：V.2, 758）由此可見，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又有多元種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及其他少數種族）的國家，孫先生不但充分理解語言分歧所帶來的困擾，尤其是「方言」衆多的中國，更非透過「語言之統一」不足以促進國家整合的進行，故乃極力推展語言之整合工作並有言曰：「語言乃用官話，此乃統一中國之精神，無庸稍變。」（1973：補篇，123）。

(三)地域觀念的衝突

就國家整合的概念而言，「國家認同」乃是任何民族國家之國民所必備的心理政治條件，而且也唯有全民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全國的人力資源亦才可能共同成為國家現代化的潛能。可是就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而言，人民普遍均有強烈的「地方性認同」的傾向，甚者更形成所謂的「鄉土本位主義」，許多的價值判斷自然很容易形成以個人地方性利益取代國家利益的現象。尤其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由於政治強調「競爭性」的遊戲規則，遂往往導致地方割據的惡性競爭，進而使民主制度為之變質。國父 在三民主義建國的經驗中，事實上也親身了解到地域觀念對國家總體發展所造成的傷害，如其在「復王永家論制贛不如攻粵函」中，就明白的指出：「惟粵陳之部落割據主義，自知與吾輩國家主義決不相容，視我軍為心腹大患，苟可制我軍於死地，任何犧牲，亦所不惜。」（1973：V.3, 385）又曰：「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位，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只是有利於個人的。」（1973：V.1, 110）由此可見，國父 孫中山先生對於地域觀念的過度擴張，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態度，因為畢竟地域觀念不適當的高漲，不但容易寄生「分離」的「意識」，同時由地方割據所導致的動亂，更非國家發展所願接受的結果。

(四)歧異的宗教信仰

依據美國學者 David E. Apter 在「新興國家的政治宗教與」(Political Religion in the New Nations) 一文中的說明，「宗教權威」在現代社會中衰退的現象，表面上雖然是在暗示舊人類思想的「解放」，但在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宗教信仰不但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甚且與政治權力的變遷，亦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存在（1963：59-79）。因為就實際的發展經驗而言，第三世界的宗教問題；除了由於宗教過多而形成彼此的衝突之外，主要宗教本身因為政治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衝突所形成的分裂，也仍然會迫使國家整合的結果不甚理想。譬如就印度這個國家而言，依據一九七一年的普查，主要教派就有「印度教」(Hindu)、「回教」(Muslim)、「錫克教」(Sikh)、「佛教」(Buddhist)、「耆那教」(Jain) 和「基督教」(Christian)

等六種，其信徒多者如印度教有四億五千三百四十幾萬，少者如耆那教亦有二百六十多萬；過去由於政教問題的衝突，本身就經常引發印度教、錫克教及回教之間大規模的政治暴動 (Park & De Mesquita, 1967: 110-112)。但如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的分析，某些宗教本身就屬於革命性的教派，基本上她們就容易以暴力的手段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Huntington & Dominguez 1975: 82)，自然對國家整合的威脅就極為嚴重了。然就孫中山先生的看法而言，基本上是肯定「宗教信仰」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同時更積極主張「政教分立」的原則，以減少宗教間因政治的問題而破壞國家之整合，故有言曰：「宗教與政治，有連帶之關係。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兄弟希望大家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則中華民國萬年鞏固，不策兄弟之幸，亦眾教友之福，萬萬同胞受賜良多矣。」(1973: V. 2, 262) 又曰：「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與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1973: V. 3, 240) 又曰：「政教分之，幾為近世文明國之公例，蓋分立則信教傳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紛擾之原因，且使教會得發揮其真美之宗旨。」(1973: V. 3, 198) 由此可見，宗教在「質」與「量」上的紛歧，固為國家整合之困擾，孫中山強調政教分之之原則，亦可反證其對國家整合不利之影響。

(五)歧視性的社會階級

「社會階級」通常是指一群具有相似的社經地位，並且在自己主觀的判斷上有別於其他社會單位之團體 (Theodorson (G.) & Theodorson (A.), 1970: 204)，因此同一階級的人，通常會有某種程度上相同的生活習慣、態度或價值標準。不過，由於社會變遷及現代化的結果，社會階級已有古今之分，換而言之，在傳統封閉的社會體系中，階級是固定的，而且有些地區是出生之後即被定型，如印度的所謂喀斯特 (caste)。就是如此。此外，更值得關切的，即這些階級之間，通常不但有價值的階層，同行亦有上下「歧視」的關係，因此就國家整合而言，傳統社會階級的存在，基本上是有其不利的影響。可見對於發展中的國家而言，由於她們大都是從傳統社會逐漸改變過來，自然「社會階級」的崩潰或重整，並不是能夠馬上完成，而國家整合的困難處，當然也是存在著的。然就孫中山的見解而言，他雖然並不否認人可能因為「能力」之不同而有社會階級之存在，但孫先生卻相當程度上反對歷史

上種種不合理的階級關係。譬如在民權主義中，他就一再批判帝王公侯伯子男民所形成的階級制度，乃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結構，故有言曰：「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己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于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拚命去爭平等，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1973：V. 1, 95）由此可見，孫先生對於社會階級的不合理性，乃是主張積極的給予改變，以尋求在「社會層面」上解除國家整合的困難。因為畢其生所要建立的社會，乃是一具有多元而開放的社會體系，階級雖然難以避免，但彼此之間是一種互助合作的關係，而非所謂「階級的鬥爭」，再則社會階級之間，亦可以在合理的條件上產生相互流動的現象，而非與生俱來或永無改變的可能，如此一來，假如全國國民均有此價值及事實上的共識與認定，則國家整合又有何難？

綜合以上國家整合的困境，吾人基本上可以發現幾項事實，即種族主義、多元性的語言、地域觀念、歧異的宗教信仰及歧視性的社會階級，大都是第三世界普遍都發生的現象，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因素不但彼此均有密切的關係在，而且亦非短時間所能立即改變者，故使國家整合的工作更加困難。再則若從動態的角度來觀察，開發中國家高度的人口成長、低度的經濟發展、不健全的教育、軍事派系的鬥爭和帝國的殖民統治，事實上亦使國家整合的工作愈加複雜，假如當地的政府未能全盤加以有系統的規劃解決，則國家整合的危機，必然始終危脅該國的政治發展。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的建國中，不論就理論或經驗上，基本上亦同時遭遇此兩項因素的衝擊，因此格外在建國理論中注重國家整合困境之解除。

五、國家整合問題的解決途徑

依據學者的研究顯示，良好的國家整合，不但是建國的基礎工程，同時也是國家人力資源能否充分統合運用的大前題，因此對於任何國家而言，國家整合乃是她們邁向現代化必經的過程。不過，對於發展中的國家而言，國家整合絕不是一種：「自動自發的過程」（automatic process），相反的，它反而是一種慢而又痛苦的過程，即如學者George E. Simpson在論及這方面的問題時所提，國家整合問題之解決，乃是一項長期而又必須保持「連續性」的工作，它不但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完全解決的，而且即使解決之後，亦非可以一勞永逸的（Echols, 1981：435）。因此，

國家整合問題之解決，不但必須隨時注意其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必須適的提出可能的解決途徑，以避免不利的因素產生惡性循環的現象。更具體而言，整個建國過程中國家整合問題之處理，事實上亦是一連串面對問題中解決困難的過程，非有極堅忍之毅力與政治智慧，實不足以解決困境，此即如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言曰：「建屋不能猝就，建國亦然，當有極堅毅之精神，而以極忍耐之力量行之。」（1973：V. 2, 357）至於國家整合之問題要如何解決呢？依據學者之研究，可以說相當複雜，尤其是許多動態性的因素，並非政府所能完全控制，全然欲求絕對之成效，恐有其事實上的困難。不過。就相對的角度來分析，以下幾種方法，可能有利於問題嚴重性之減低，現且逐一分述於后：

（一）自主性的同化

依據學者George E. Simpson的界定，「同化」乃是不同種族背景的个人或團體，自由自在的相互往來與生活（1968：V. 3, 438）。社會學家William F. Ogburn和Meyer F. Nimkoff亦認為「同化」就是原本不相同的个人或團體逐漸趨於相同的過程（1950：185）。由此可知，「同化」基本上乃是表示不同種族與文化背景者在相互接收中逐漸趨於「近似」（proximity）或「同質」（homogeneity）的過程，本質上與整合的意義相當類似。不過，依據學者的研究顯示，「同化」必須是種漸近與自主的過程，假如政府以強大的「武力」進行「強迫性」的同化，則其間所產生種種抗拒的現象，勢必嚴重影響同化的效果，甚者更能因此不適當方法而導致種種難以控制的暴動。再則，依據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驗說明，譬如政府採取強制性的「種族隔離政策」如南非的種族分別發展政策，則其內部反而會因為所謂的強制性而延生許多「不平等」所造成的衝突。因此就國家整合的角度而言，種族同化雖有利於衝突的化解，但如何保持「漸近」、「溫和」及「自主性」的原則，卻是其是否成功的基礎。然就 孫中山的主張而言，他不但認為「持三民主義以治國，首圖民族之融化」（1973：V. 3, 882）又曰：「既為人人共有之國家，則國家之權利，人人當共享，而國家之義務，人人亦當共擔。界無分乎軍學農工商，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1973：V. 2, 265）由此可見，種族同化乃是 孫中山進行國家整合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其謂「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治之，以成

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1973：V.2, 156) 事實上，亦顯示 孫中山不但不是一位「種族中心主義者」，相反的更是一位強調「理性容忍」及「相待以誠」的同化論者，對於國家整合的精髓，實有相當的了解。

(二) 國家認同感的建立

依據學者Dankwant A. Rustow的分析，在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人民強烈的「國家認同感」，乃是其建國的重要根基(1967：35)。因為假如一國之內的人民，普通只認同於地方的部族或派系，或根本在心理上就排斥國家的政治系統，則要使國民產生相互義務感或責任心，甚至化解一些分歧性的衝突，事實上就有其不可避免的困難，所謂「國家整合」的關係，自然也就無法解決。因此學者Raymond Grew所言，強烈的國家認同，對於國家不但可以提供有效人力資源動員的基礎，對於成員之間政治信任感之增強與社會衝突之克服，亦可發揮相當的功效(1978：17-18)，事實上也是在闡明國家認同之建立，對於國家整合而言，乃是一項重要的心理基礎。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的建國中，首重民族主義之發展，他不但主張儘早去除「家族主義」及「宗族主義」之陰影，更期望全民建立堅強的國家觀念，以從事國家現代化之努力，故有言曰：「吾人今日要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人人當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同心協力，共同締進。」(1973：V.3, 508) 又曰：「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1973：V.1, 55-56) 由此可見，對於國家整合而言，孫中山強調建立忠於國家的認同感，乃是其極為主要的主張之一。更具體而言，孫中山以建立「國家認同感」的方式來從事建國的努力，對國家整合而言，乃是一項相當重要而又有效的途徑，因為畢竟只有全民接受效忠國家的概念，人民自然才很容易拋棄個人或地方的私利以成全國家之公利，則所謂地方割據或派系嚴重鬥爭的現象，亦會易於隨之減少。

(三) 價值共識之形成

依據學者的研究顯示，人類的行為，除生理性的反應外，通常均受價值觀念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因此假如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整個政治體系的成員都有相類似或相同的價值選擇，則其所產生的「集體行為」，必然有利於國家整合的形成，對於

政治發展而言，更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故美國學者Donald G. Morrison和Hugh M. Stevenson在研究非洲地區「整合」與「安定」的相關性時，亦發現發展中國家建立「價值的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 乃是維持政治秩序的基本條件之一 (1972：925)，事實上也在表明此項道理。再則就民主政治之運作而言，假如全民對民主的意識型態有基本的共識，則其所表現的民主行爲，自然會有利於民主價質之落實。美國學者Lucian W. Pye認爲意識型態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不但可以提供人民了解新的認同，同時亦可建立全民對發展所需要的價值 (1962：288)，基本上亦在說明意識型態的價值共識，對於國家整合的重要性。因此就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而言，其提出以三民主義此種意識型態做爲建國之標的，基本上當然是已經重視到共識對國家整合的重要地位。因爲就經驗上而言，事實上孫先生也已經歷過缺乏價值共識的痛苦，故有言曰：「民國成立到今日，已經過了十二年，這十二年中，沒有一天沒有變亂。這個變亂不已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便是因爲新舊潮流的衝突。詳細的說，便是因爲舊思想要消滅新思想，新思想也要消滅舊思想。新舊思想迭相攻擊，所以禍亂便循環不已。」(1973：V.2,500) 又曰：「今所切望於同志者，即在竭力宣傳主義，務使群眾趨於一致。」(1973：V.3,821) 由此可見，孫先生對於國家整合的問題，相當重視意識型態上價值共識之形成，而此一主張對於國家發展或政治發展，均有利於政治秩序及安定之建立。

(四) 溝通能力之培養

依據學者之界定，「溝通」乃是人們彼此交換有意義的符號 (meaningful symbols) 並達成相互了解及建立和諧關係的過程 (Williams, 1984：8-10)。由此吾人不難了解，「溝通」乃是人與人之間透過訊息之交換而產生互爲主體性了解的過程，對於國家整合而言，頗具發展的價值。因爲假如國家內即充滿多元性的衝突，政府與人民之間卻缺乏基本的溝通能力，則國家發展方向的共識，自然也就難以形成，相反的，不同的意思亦可以因爲缺乏溝通而轉變成衝突與對立，對國家整合的目標而言，豈不見有背道而馳之嫌？故學者Daniel Lerner, Donald J. McGrone 和 Charles F. Cnuddle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時，乃具體的指出，溝通能力乃是非西方國家人民追求民主發展的主要條件，蓋任何缺乏溝通能力的人民，是無法成功運作民主制度的 (Lerner, 1958：60, McGrone & Cnuddle, 1967：72-79)。

然溝通的能力又爲何呢？一般的見解也許相當紛歧，但就學者的研究顯示，溝通能力通常分成兩大類，其一是當事人使用傳播科技的能力，其二是當事人運用知識、心理、語言之軟體技巧。假如溝通者受過良好溝通技巧之訓練，本身又能精確的運用最現代化的傳播工具，則他將會被認爲是具有相當溝通能力的人。因此就國家整合而言，假如政府能一方面提升國內傳播科技之能力，二方面又能訓練人民成熟的運用溝通技巧及溝通工具，則對於內部衝突之解決或減少，必能發揮正面而又積極的功能。故學者Ronald Rothchild在研究有關的問題中乃提出一項說明，即爲了改善第三世界異質性的社會結構，如何增強政府與人民種種理性化的商議、妥協、平衡、讓步及合作的溝通技巧，乃是她們走向民民主與整合的基本條件（1970：165），事實上也在強調溝通對民主發展與國家整合的重要性。然對於孫中山這方面的主張而言，他雖然並沒有高度專業化的理論提出，但就溝通能力的重視程度而言，仍然可以從其主張中略知一二。譬如就溝通能力的硬體部分，孫先生相當強調國內交通系統之建立，實業計劃之提出即是其具體的成就。其次對於溝通能力的軟體部分，孫先生首重「誠」字的溝通心態，故有言曰：「危急存亡之秋，下宜開誠布公，同心協力，以共扶危局；若彼此互相猜忌，妄相付會，則愈想愈灣矣。」（1973：補篇，403）又曰：「持之以堅忍，出之以至誠而懇求之，則終末有不動心者。」（1973：V.3, 60）其次在溝通中，孫先生也強調必須避免感情用事，依狀況逐步應變，故有言曰：「你們聽了我的話，明白了這件事的道理之後，回去講給大家知道，都要心平氣和，來互相考究這個問題，決不可感情用事，從中鼓噪，擾亂大家的治安。」（1973：V.3, 704）又曰：「向弼翁游說，必得承諾而後已……惟運動之方面，必隨時而變，先當動之以大義；不成矣，必再動之以大利，相此兩方法，兄等必已試之而無驗。然更有一法，則當動之以情誼……惟用此法，必得多人合力，方易成事。」（1973：V.3, 704）最後論及「會議溝通」的問題，依學者之解釋，乃是指大眾依據一定的理性程序進行團體性面談並達成意義整合的過程，因此對於每一位現代國民而言，只要普遍具有會議溝通之能力，則對國家整合能力之增強，必大有助益。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此能力之培養，不但極表重視，更編著一本名爲「民權初步」之書籍，以茲推度，其在序言中明示：「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於國人，使成爲一普通之常識。」（1973：V.1, 669）由此可見，「沟通能力」之培藝，不論硬體或軟體，孫先生均頗爲重視，相信只要全體

國民都能本此原則身體力行，則不但國家之整合將有所改善民主政治之運作，亦可日趨步入常軌。

(五)精英分子之整合

依據學者研究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顯示，一個新興國家是否能同時保持「安定」與「發展」，大都必須視其政治精英整合的狀況而定，因為他們畢竟是居於「發展可能性」的策略中心 (Seligman, 1971 : 330)，故學者Robert D. Putnam亦堅決的肯定精英分子的整合，對促成政治安定及提高政治效能而言，乃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 (Higley & Moore, 1981 : 581-582)。由此可見，國家發展中的精英分子，不論在朝或在野，只要能產生共識，則其間因「對立」所產生的緊張情勢，必可大為降低，對國家整合而言，亦是其目標達成的重要途徑之一。當代學者Arend Lüphart所提倡的「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基本上也是促成精英整合的具體發展方向 (Lüphart, 1977 : 25) 尤其是對於由權威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國家而言，朝野精英應於政治共識中進行和平移轉的任務，否則如學者Donald Share研究調查發現，很容易產生革命政變的種種問題 (1987 : 530)。至於孫先生之主張，基本上亦相當強調精英整合的重要，故有言曰：「國家的大事，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夠成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1973 : V. 2, 592) 又曰：「國事艱鉅，不有賢勞，共起維持，其何能濟？」(1973 : V. 3, 854) 又曰：「文嘗謂有能力者能以主義相結合，而後統一可言。」(1973 : V. 3, 731) 對於政黨精英的合作問題，孫先生更要求必須捐棄成見私利，共同建設國家，故曰：「今日破壞告終，建設伊始，各政黨，各團體務宜聯絡一氣，以國家為前提，而不能以本黨為前提。直言之，即各自犧牲其本黨，以為國家也。若各自為謀，則甚非國家之福。」(1973 : V. 2, 277) 又曰：「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於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於黨外不可。」(1973 : V. 2, 539) 由此可見，孫先生強調之精英整合，純粹是立基於國家整體利益之上，毫無私心可言，對國家整合而言，亦提供了一項頗具價值的途徑。

(六)平等的政策取向

依據學者的研究指出，愈是「不平等」的政策，愈容易引起「衝突」的擴張，

因此就國家整合的角度而言，政府的任何政策取向或是政策輸出，均必須確實把握平等的原則，因為依據學者分析，「平等」不只是包含有相同的意思，基本上它乃是根據於「正義」的基礎上，學者Robert E. Lane 將正義的動機 (the justice motive) 分離出「同等的正義」(the justice of parity)、「公平的正義」(the justice of equality) 和「需要的正義」(the justice of need) 三種 (1979: 6)，事實上就是在說明平等與正義的關係極為密切，而失去平等之後所產生的衝突，亦是可以由正義失去的面向而有所了解。再則就國家整合的效果及平等的內含來分析，平等表面上雖然可分為「數目的平等」(numerical equality) 和「比例的平等」(proportional equality) 兩種，但前面的平等較傾向於形式之平等，而後者則傾向於包含社會正義的真平等如機會之均等，對國家整合而言，自然以後者較不易引起衝突，因此如何真正掌握平等的精髓而達到「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乃是政府政策決定及國家整合間不可輕易忽視的主題。不過就孫中山的建國理論而言，始終都以「平等」為其立論之根據，同時其所主張的平等，並非平頭式的平等，而是所謂「立足點平等」的「真平等」，故有言曰：「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很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1973: V. 2, 637) 又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故革命以後，必要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理」(1973: V. 1, 93) 由此可見孫先生所極力倡導的平等觀念，對於國家整合而言，不失為是一項重要的解決原則。

(七) 合法性的增強

依據一般學者之研究，政權之建立假如缺乏「合法性」的基礎，該政權亦難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換而言之，「合法性」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國家整合亦必須以它為基礎，結果才容易被持續性的肯定。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建國理論中，雖未直接使用合法性的概念，但他所一再強調的「人心」，事實上就是合法性形成的基礎條件，而且兩者也是一體的兩面，不可完全分離，故假如國家整合的過程中，能確實掌握人心，則必然有事半功倍之效。故孫先生語重心長的指出：「我們要國家鞏固，永遠不倒-----要用人心的基礎，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礎。人人的心內都贊

成民國，傾向民國，然後民國才不致倒，才可鞏固」(1973：V.2，676) 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1973：V.2，559) 又曰：「統一之法，非恃人心，則恃武力。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於專制。然人心不能統一，必生禍亂。」(1973：V.2，229) 由此可見，爭取人心或獲取合法性，乃是孫中山國家整合的重要途徑之一。

(八)法律的運作

就理論上而言，「法律」通常被認為是依據「理性」的原則所形成的一種「應為」的具體規範。(詹文雄譯，1984：67；程建人譯，1969：104-105) 因此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假如能充分運用法律的這項特性，則必有良好的效果出現，而此也正顯示不管是否民主的國家，均全部以法律為治理工具之原因。不過，國際法學家J.E. Brierly則認為，所謂法律並不只因為它是一種「約束」，而是當它成為「正義」的才可成為約束「(翁志忠譯：1981-109) 由此可見，假如法律從制訂到執行，均能建立在「正義」和「理性」的程度上，則其所產生的「約束力」必容易為大家所接受，則所謂國家整合的目的，並不難逐漸達到。國父 孫中山先對於法律的重視，基本上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嘗曰：「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於二十世紀文明競爭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遏邪辟。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自訟爭。西洋史載，班班可考。無他，人民知法之尊嚴莊重，而能終身以之耳。」又曰：「立憲之國，時有黨爭，爭之以公理法律，是為文明之爭，圖國事進步之爭也。」(1973：V.2，342) 由此可見，以法律為國家整合之途徑，事實上也是 孫先生所始終堅持之主張。

(九)武力之整合

依據學者 S. N. Eisenstadt的分析，「現代化」所需要的不只是相對穩定的結構，而且亦必須有能力去適應持續性變遷的條件與問題 (1967：439)。可是實際的經驗顯示，開發中的國家，由於受制於環境的影響，對於許許多危機的處理，可能比我們想像中更少有選擇的機會 (Nettle, 1969：34)。因此在國家整合的初級階段，尤其是當新政權剛剛成立之後，往往為了儘快收拾殘局，恢復社會秩序和正常的經濟生活，有時就不得不使用壓力和暴力。許多歷史例子中顯示，在革命的情境中，

急進派的領導人物似乎較能夠擔負起國家重建的任務，而取代了先前得勢的溫和派領袖（江炳倫，1982：333-324）。由此可見，對於國家整合而言，武力之使用是必須在最特殊的狀況下或沒有其他更溫和的方法可以取代的狀況中方可採行，否則凡事以武力做為整合的工具，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國父 孫中山先生對於這方面的主張，基本上也是採取相當理性而有選擇的方式來進行，即假如整合的問題可能透過法律談判等溫和的方式加以解決，則絕不採用武力之統一，故嘗曰：「商團蓄謀叛逆，政府已屢加容忍，而終不悛，不得已以武力解散。」（1973：V.3,974）又曰：「藉言論或妥協統一，恰如沙上樓閣，行即崩潰，後陷於四分五裂之狀也，明甚。既有武力統一之必要…」（1973：V.3,236）由以上之說明，吾人更能了解，孫先生採取武力統一的途徑，基本上乃是最後迫於無奈才使用者，即是在所有可能的和平方法均無告失效的狀況下才考慮使，本質上是一種理性的方法來處理國家整合的困境，相當值得重視。

(十)獨立自主而又有效率的政府

依據學者的研究發現，第三世界國家整合的危機，通常都面臨兩項難以逃避的困境，其一是國家受殖民統治的影響，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其二則是政府本身的腐化而形成沒有效率的政府。因此在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如何一方面擺脫國際帝國主義的控制，二方面亦能加速建立有效率的廉能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切現代化的基礎。否則政府行政效率脆弱，凡事又受制於國際資本主義大國，則其國家整合的能力，自然難以提升，尤其是國土的被瓜分，內部資本家和國外資本家共同勾結，形成派系的利益分配，則國家又何以整合？故國父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建國中，不但首重中國之獨之自主，次則強調萬能政府之建立，對於國家整合，實提供了一項最重要的發展途徑。其嘗言：「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特別權利……並且在那些特權之外，來妄用條約，濫用條約。」（1973：V.2,875）又曰：「從瓜分中國的論調發生了以後，各國都想在中國沿海口岸先佔一個根據地，然後才由此發展進佔中國內地。所以德國佔青島，俄國佔旅順、大連……法國佔廣州灣！英國佔香港、威海衛……」（1973：V.2,878）由此可見，國家領土的被瓜分，就領土整合而言，事實上就是嚴重的危機，孫先生極力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力求

中國主權之獨立自主，基本上這就是國家整合的首要途徑，至於提升行政效率的局面，孫先生不論就人才或制度，均力求革新，故有言曰：「中國現行政治……身為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枉，無行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

(1973：V.2，40) 又曰：「整理行政最先之方法，而今後亟須本之進行，始可收整理之效者，約五大端，一曰劃分中史與地方之權限……一曰汰冗員……一曰併閉署……一曰勵行官吏登庸考試……一曰實行懲戒官吏失職……」(1973：V.1，801) 由此吾人不難發現，孫先生力行「行政革新」的主張，一方面可於升行政效率，二方面對國家整合的基礎力量，亦可完成奠基的工作，再若加上政府獨立自主權之恢復，則國家整合的基本力量便告形成。

六、總 結

由前面的分析中，吾人不難察覺國家整合的工作，乃是一項多元性條件相互配合始能湊效的任務，因此第三世界只要肯定現代化民主化的「民族國家」是其追求的「目標」，國家整合的挑戰乃就是無法逃避的責任。同時，依據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國家整合乃是一項「長期」而又「艱辛」的工作，故必須依據不同的「時機」或「狀況」採用不同的整合方略，方可能有所成效，亦如孫先生所言：「世情嶮巇，殊可慨嘆……夫當非常之事變，要有非常之幹略」(1973：V.3，1765)，即假如在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因為使用的「方法」不對而導致「政治不安定」或「社會失序」，則其所付出的代價，將是極為昂貴。因此總結而言，國家整合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必要的，其成功的結果固然值得「讚賞」，其間「辛苦」的「歷程」卻是必須用「能力」來面對的。

參考資料

孫文

1973 國父全集。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編。

詹文雄譯 (P. E. Jacob & J. V. Toscano 著)

1981 「論整合的過程：政治主會的基礎分析之指標」，憲政思潮，55期，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

1984 (千葉正二著) 「公權力的社會理論」，憲政思潮，66期。

程建人譯 (Paul Wdelfl 著)

1969 「法律的性質制裁和自然」，憲政思潮，8期。

翁志宗譯 (R. K. Woetzel 著)

1981 「民主和政治義務」，憲政思潮，53期。

金平歐等編

1955 「全國律師民刑新訴訟狀匯賢序言」，三民主義辭典。

江炳倫

1982 「革命的緣由與歷程」，憲政思潮，57期。

Almond, Gabriel A.

1970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 Little, Brown & Co.

Apter, David E.

1963 "Political Religion in the New Nations," Clifford Greetz,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 Y. : The Free Press.

Binder, Leonard

1964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V 111 : 623。

Echols, John M.

1981 "Racial and Ethnic Inequality : Comparative Impact of Soc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Eisenstadt, S. N.

- 1967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der in Mordernization," In Ronald cohen & John middlet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Univesity of Texas Press.
- Emerson, Rupert & Michael Brecher
- 1963 (E)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the New States,"
(B)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New States of Asia," in Harry Eckstein & David E. Apter (eds.), *Comparative Policies*. The Free press of Glenowe.
- 1973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in John T. Malister (e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ci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Rondon House.
- Grew, Raymond
- 1978 "The Crises and Their Sequences," in R. Grew (ed.), *Crises and Political Developrnt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stity press.
- Higley, John and Gren Morc
- 1981 "Elite Inte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n,"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581-582 °
-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rge I. Dominguez
- 1975 "Politccal Development,"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i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Addison-Wesley Purlishing Company, Inc.
- Keesing, Roger M •
- 1981 *Cu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he Dryden Press.
- Lane, Robert E.
- 1979 "Motives For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The Effects of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Psychology*, 1 : 6 °
- Lerner, Daniel

-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 Y.: The Free press.
- 1967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D. Lerner & W. Schramm (eds.), *Communication and Chang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 Lipphart, Arend
-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Yale Univ. Press.
- Mcgrone, Donald J. & Charles F. Cneedle
- 1967 "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I: 72-79.
- Morrison, Donall G. & Hugh M. Stevenson
- 1972 "Integration and Instability: Patterns of Af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VI (3): 925.
- Nettle, J. P.
- 1969 "Strateg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lin Leys (ed.), *Politics and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i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 Press.
- Nordlinger, Eric A.
- 1977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 N. J. Englewood Cliffs.
- Ogburn, William F. & Meyer F. Ninkoff
- 1950 *Sociology*. Boston: Hoagton Mifflin Company.
- Packenhams, Robert A.
- 1966 "Political Development Doctrines in the American Foreign and Program," *World Politics*, XVIII (2): 204.
- Park, Richard L.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 1967 *India's Political System*. N. J.: Prenticehall Inc.
- Pennock, J. Roland

- 1979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 Press.
- Pye, Lucian W.
1962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al-Bulding :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ies*. New Haven : Yale Univ. Press.
- Rothchild, Ronald
1970 "Ethnic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World Polictics*, XXII : 165.
- Rustow, Dankwart A.
1967 *A World of Nations : Problem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Brockings Instituetete.
- Sanders, David
1981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MacMillan Press.
- Scott, James C.
1971 "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Corruption," in Claude E. welch, Jr. (e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Change*.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Seligman, Lester G.
1971 "Elite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son L. Finkle & Richard W. Galle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Y. : John Viley & Sons Inc.
- Share, Donald
1987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a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 (4): 530.
- Shils, Edward
1962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The Hague : Mouton.
- Simpson, George E.
1968 "Assimilation," in David L. Shies (ed.), *Internatione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Mac 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 Theodorson, George A. & Achilles G. Thederson

1970 *A Moder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ppllo Edition.

Weiner, Myron

1966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son L. Finkle & Richard W. Gable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 Y. : John Villey & Sons, Inc.

Wriggins, Howard

1966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Myron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Y. : Basic Books, Inc.

Williams, Frederick

1984 *The New Commumication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Young, Crawford

1976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lural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Dr. Sun's Ideas on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Jian-wen Perng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building,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emerging states will experience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if they are to succeed as democratic states. Especially, in any transitional and heterogeneous society, a lot of marked political conflicts usually derive from ethnic diversity, linguistic cleavage, regional and factious struggles. In other words, these developmental phenomena in the third world may be the major barriers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To deal with them requires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sincere concern but also its strong will to make a great effort. Otherwise, instead of nation-building, these dilemmas may result in nation-destroying.

As for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 from 1911 to 1925, Dr. Sun-yet Sen emphasized some great ideas such as national assimilation, elite-mass cooperation, ideological consensus equal-oriented policy and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to improve political integration, although he did not have much success in getting national integration until he died. Thus, the intent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Dr. Sun's idea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evaluate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third world.